



[美]萨沙·阿奇博尔德 西纳·纳杰菲 戴维·格林伯格 保罗·科林斯/著 喻明星/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总统的涂鸦

PRESIDENTIAL DOODLES



26位美国总统的涂鸦手迹

看看
大人物在做
什么
小动作?



原书名： Presidential doodles
Copyright © 2006 by Immortal Incorporated
Foreword copyright 2006 by Paul Collin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essler Literacy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获得本书中文简体版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权
版权登记号：18-2007-8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总统的涂鸦 / （美）阿奇博尔德等著；喻明星译.—长
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357-5233-8
I. 总… II. ①阿… ②喻… III. 总统一人物研究—美国
IV. K837.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8629 号

总统的涂鸦

著 者：[美]萨沙·阿奇博尔德 西纳·纳杰菲
戴维·格林伯格 保罗·科林斯

译 者：喻明星

策划编辑：孙桂均 李 媛

文字编辑：陈一心

出版发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长沙市湘雅路 276 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本社直销科 0731 - 4375808

印 刷：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 址：长沙市河西望城坡航天大院

邮 编：410205

出版日期：200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 本：787mm×1092mm 1/24

印 张：8.5

字 数：133000

书 号：ISBN 978-7-5357-5233-8

定 价：19.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序言 涂鸦大师

002

导言 总统涂鸦简史 戴维·格林伯格

007

乔治·华盛顿 (1789~1797)

022

约翰·亚当斯 (1797~1801)

028

托马斯·杰斐逊 (1801~1809)

030

詹姆士·门罗 (1817~1825)

034

约翰·昆西·亚当斯 (1825~1829)

036

安德鲁·杰克逊 (1829~1837)

040

马丁·范·伯伦 (1837~1841)

044

威廉·亨利·哈里逊 (1841)

048

亚伯拉罕·林肯 (1861~1865)

050

尤利塞斯·S·格兰特 (1869~1877)

052

拉瑟福德·B·海斯 (1877~1881)

056

詹姆斯·艾布拉姆·加菲尔德 (1881)

060

本杰明·哈里森 (1889~18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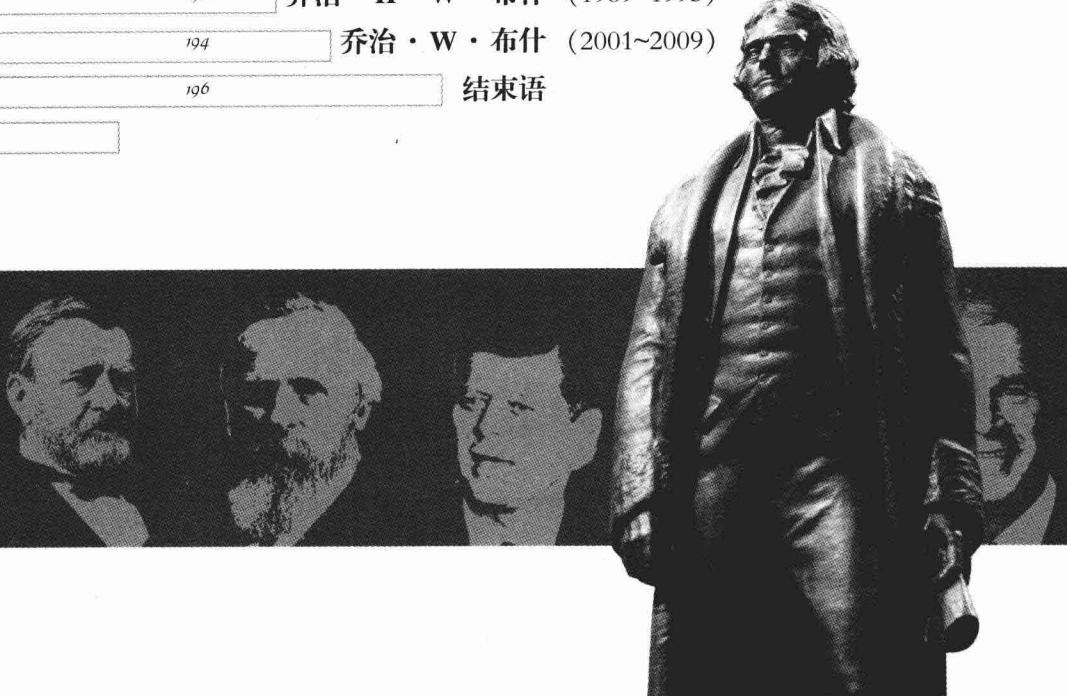
064

目录



- 068 西奥多·罗斯福 (1901~1909)
072 沃伦·G·哈定 (1921~1923)
074 卡尔文·柯立芝 (1923~1929)
076 赫伯特·胡佛 (1929~1933)
090 富兰克林·罗斯福 (1933~1945)
100 哈里·杜鲁门 (1945~1953)
104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1953~1961)
126 约翰·F·肯尼迪 (1961~1963)
144 林登·B·约翰逊 (1963~1969)
164 理查德·尼克松 (1969~1974)
170 罗纳德·里根 (1981~1989)
190 乔治·H·W·布什 (1989~1993)
194 乔治·W·布什 (2001~2009)

196 结束语





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丢掉，如果不怕别人拾走的话。

——奥斯卡·怀尔德



序言

涂鸦大师



决定

决定 决定

决定……决定……决定

某记者注意到,1961年刚上台不久的约翰·肯尼迪在一个黄色的带横格的便笺本上,一连将这个字写了17遍之多,“或加底线,或加一个框框,或删去”。说实话,他写了17遍,却写错了17次,将“决定”(decision)写成了“决定”(decesion)。即使写错了,这算不了什么,大不了……谁又见了?不对,有数百万的人看见了。那是后来,即1964年夏天,在肯尼迪遇刺之后,他的涂鸦大作——他画的船和加了底线或方框框的字句等——接连在23个城市作纪念性的展出,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参观者。人们排着长队,渴望着从这些简单的遗物中一睹总统复杂的人生。

用削尖的鹅毛管作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并非办不到。让你费尽苦心的是,要特别认真地削鹅毛管子:先要用铅笔刀的背面刮鹅毛管的表面,接着用刀刃把管子削成斜尖,在尖端的中间开一个小裂缝。稍有



不慎,你还得从头再来,还有,你得备下创可贴。这样一来,你就不会认为那些眼睛睁得大大的面孔,没有生气的线条,炫耀着大牙的狗等涂鸦来得容易了。

在我们的开国总统中为什么涂鸦者那么少,现在你该知道原因了吧。

再说,即使鹅毛管削好了,用起来仍很难:不协调,要不断地蘸墨水,而且尖头很快就钝了。18世纪开会时都由一个秘书作记录,用鹅毛管写字这项工作意味着就由秘书担负了,其他人不希望受这份罪。而对秘书的要求是字迹不能潦草。如今白宫开会时,与会者都有纸和笔,他们可以随意画圈圈了,再也用不着削鹅毛管和一次又一次地蘸墨水了。人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事情一下子就变成现在这种情况了。让我们回到1959年,首创圆珠笔的生产者发现公众对圆珠笔有所顾虑时,为了他的这个极其时髦的书写工具能够被采纳,不得不给它装上木笔杆,假扮成铅笔。

事实上,总统涂鸦——如果不是赛马——有三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是钢笔的发明。如同其他有用处的发明一样,最初,钢笔也并未被看好。威廉逊是19世纪初巴尔的摩的一名珠宝商人。他对削鹅毛管感到很烦。在绝望中,他发明了一种金属的笔管,永远也用不着去削尖。他虽然没有让他的新发明老是粗制滥造,但也没很快改变它。他就只能从自己的发明中每个月赚600美元而已。到了1823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帕利的英国人大批量地生产这种钢笔,新一代儿童们学会了用这种新奇的“金属管子”写字。一本教科书断然宣称:“金属笔占了上风,鹅毛管子永远再见了。”

接下来是纸的问题。早先,纸是用破布造的。钢笔现世后,纸的需要超过了旧衣烂布的供应,一时间“洛阳纸贵”,谁也不会乱涂乱画去浪费纸张。干草、麻,凡是能用来作造纸原料的都用上了。1843年,德国发明家弗里德瑞·凯勒首先开发了一种规模造纸的先进方法:用沉淀的木浆造纸。成品纸用铁路运输很方便,纸张很快便充裕起来,到处都有活页本、拍纸本以及卷筒纸出售。

书写更加简便自如,写出的东西更像涂鸦了。19世纪中期的一些书法教师们常用自己独特华丽的书写,甚至用各种形式的犄角、鸟类、鱼类等构成的奇特图画来炫耀自己。到林肯时代,过去用铅笔的孩子们已经逐渐长大,他们习惯草书,并在很便宜的本子上、在拉丁语语法本子的空白页上,一遍一遍地写写画画。就连他们的校长也宣称:也许这些孩子中将会有成为总统。

共和党人是最伟大的涂鸦者。任何一个民主党人生气时,只要想到19世纪时口头上所说的doodler(涂鸦)这个词也指贪官(*corrupt politician*)时就不会生气了。当谈到本义的涂鸦这个话题时,共和党的总统明显领先:他们“能”(can)画“乌龟”,也一定画过船。里根经常在开会时把他函授课程风格的涂鸦当做赠品免费送给别人。艾森豪威尔政府喜欢组画,所以他的助手投其所好,请阁员们和来访的客人创作一些图画。事实上这些画后来也成为“白宫画品”(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的藏品中收有丁·爱德加·胡福的“瑞士乡村”和埃塞尔·梅曼画的“老磨坊”)。赫伯特·胡佛以画美丽的几何图形著名。他还在位时,他的手稿的收藏者们就开始了争夺行动。1930年一个收藏者把胡佛涂鸦中的一些图案印染到纺织品上,标上“胡佛涂鸦童装”字样,供孩子们选用。



白宫其他涂鸦没有这样张扬。20世纪中期流行这样一种看法：涂鸦会让人看透涂鸦者不安的内心世界。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叮嘱手下，每次会议结束后要仔细地把他的涂鸦收拾好，免得让密探们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是杜勒斯自己也清楚，击中靶心的涂鸦也是一种武器。在一次谈判中，杜勒斯不停地用小刀子削铅笔，不停地在纸上涂鸦，把前苏联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激怒了。这倒是一点不逊于当时在座的约瑟夫·斯大林。一位参加谈判的美国人注意到斯大林也在涂鸦：用红色铅笔画了一个心，在心上画了一个问号。

虽然总统的涂鸦未惹什么麻烦，但白宫的其他人的某些涂鸦偶尔会引起一些不愉快。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逊因他的涂鸦激怒了尼克松。罗斯福(FDR)经济大萧条时期主管经济恢复工作的休·约翰逊(Hugh Johnson)因在新闻发布会上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写下“Hell”(烦人)两字而惹来麻烦；近些时候，米歇尔·格松(乔治·W·布什的撰稿人)怪异的涂鸦令别人瞠目结舌。《纽约时报》引述过卡尔·罗夫与格松说过的笑话，“如果这些也成为总统档案的一部分，未来的史学家一定会说，总统身边有一帮神经错乱的人。”

的确如此。

“涂鸦”是什么意思？虽然一些人喜欢胡佛的涂鸦，特别是这些涂鸦的视觉质量，例如，1968年画家路易斯·塞耶展出了25幅胡佛的画，但是，另一些人却力图从画上去推测胡佛的人格。1982年，《时代》杂志把胡佛的涂鸦推荐给一位所谓的书法家，这位书法家认为“胡佛是最糊涂的总统”，而早在1947年，《纽约时报》曾作过调查，专家们确信，胡佛“十分活跃，很有组织能力”。伦敦报纸为了不让别人胜过自己，在一次

经济高峰会议散会后,他们利索地夺到了留在托尼·布莱尔首相桌子上的一页纸,请来书画家,甚至还有一个洞察力敏锐的专家,他们沾沾自喜地宣称说,布莱尔的涂鸦显示他思想易变,难以对付,不胜重任。非常不幸的是他们的综合评价忽略了一件事:那页涂鸦根本不是布莱尔的,也不是布什的或任何一个国家的首脑的。事后证实,这位被据称是无所作为、满脑子糊涂的涂鸦者,却是微软大王、亿万富翁比尔·盖茨——一位老是忘记带走自己的东西。想着什么就能画出什么的伙计。

除了反映一瞬间的想法之外,涂鸦不易暴露个人的内心世界。1942年,美国的洗衣行业宣称他们做过一项商业性调查,发现餐馆的桌布有90%印有与战争有关的涂鸦,例如地图、箭头等。一位记者冷淡地评论道:“涂鸦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才华横溢的谋略并没有过多地给洗衣业主留下印象。”洗衣行业的这项策划明显地表示了他们对总统涂鸦的无知:总统涂鸦通常只是一种暗示。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涂鸦会令人如此注目的缘故。如果说涂鸦很有意义,并不是说他们是伟大的艺术或者是伟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平凡。历史学家作了很大努力去维护“公开使用”原则,因而人们能看到这些涂鸦——“他们属于我们大家”。当我们在观看这些涂鸦时好像就是看我们自己的字和自己的画。黄色拍纸本上的那些画或者潦草的文字好像古代的岩壁画:如此熟悉却又难以想象地遥远。



导言

总统涂鸦简史

戴维·格林伯格



1993年10月3日，索马里自卫军在摩加迪沙开枪射杀了18名美国士兵，其后不久，克林顿总统在白宫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事后，反恐专家理查德·克拉克回忆当时情况时写道，当助手们在讨论局势时，总统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当他们把自己的意见讲完之后，克林顿停止了涂鸦，抬起头。‘好的，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但克拉克的话似乎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本届总统执政时期国际危机如此严重，自由世界的领袖居然还在涂鸦！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有效地讨论最严重的事件时，我们不希望看到总统犹豫不决，甚至看到他在画一些小玩意。当沃伦·克里夫托、莱斯·阿斯平、科林·鲍威尔在大谈全球战略性的重要性时，总指挥却在本子上涂写一些没有意思的符号。虽不能说他玩忽职守，但至少说明他注意力不集中。然而克拉克的意思恰恰与此相反。从克拉克的述说中看出，他有一种极高的自信：克林顿因为已胸有成竹，才会有此心情涂鸦。

克拉克不是高官中用涂鸦制造喜剧效果的唯一的一位作者。历史学家赫伯特·帕尔梅在描述国务卿杜勒斯在1950年轻视他的英国对手

这件事时是这样写的：“这必定……已激怒了英国人艾登，因而艾登向杜勒斯提出抗议，因为这位美国人在纸上涂鸦，仅仅带着嘲笑的眼光偶尔抬头瞟一眼，似乎告诉人家他已经知道下面会说什么了。”艾森豪威尔的科学顾问乔治·基斯佳可夫斯基在描述总统时这样写道，总统在亲自听助手谈论苏联的威胁正在升级时，“突然停止涂鸦，举起一只手，说：‘谁持不同意见又得不到支持的，请发言。’”彼德·艾德曼——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的前助手——说过，“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生前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漫不经心地在办公纸上写着‘Poverty’这个字。”从不少情况看到，涂鸦——或者涂鸦的近亲——已进入政治之道。里根的手下帕特·沙比兰因在某次开会时一遍又一遍写“屈从于犹太人压力”而惹上麻烦，这次会上讨论的是总统是否应放弃去纳粹墓地的计划这一问题。

总统涂鸦的意象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效果。它能通过把大赌注的戏剧性和世俗的习性相提并论使我们受到刺激；它能用揭露世界上最具权势的人幼稚的一面的方法扰乱我们的思绪；它用暗示涂鸦者对他的对话者不值一顾的藐视方式震动我们；或者它能使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事情在正式的交流中无法表达，而随随便便的暗示却产生完满表达的效果。

不管特殊效果是什么，总统的涂鸦具有迷惑力是无法否认的。问题在于：为什么。

涂鸦自古就有。南非的洞穴画和（亚洲西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土碑都有与他们的主题无关、漫无目的的符号。然而，直到公元 18 世纪“doodle”这个词才被用来表示一种潦草的、漫不经心的笔迹，并且人们



开始学习这种形式。对“doodle”的译释是从心理分析开始的，因为人们普遍认为通过仔细观察涂鸦，可以看出隐藏在“艺术家”内心深处的无意识的想法。

第一位赏识涂鸦，或者说靠此道赚钱的人，是 18 世纪中期著名的约瑟尔·阿伦德尔。这位极富色彩的人物生于 1902 年，20 年代曾经做过记者，20~30 年代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做职员。早在总统山纪念馆(Mount Rushmore Memorial Commission)服务时他就开始对总统的画感兴趣了。后来，他在为糖业做说客时，和约瑟夫·麦卡锡议员交上了朋友。他向麦卡锡送去了名义上是“借款”的一张 2 万美元的支票因而受到传唤。1949 年，他买下了新斯科舍半岛以外的一个小岛，并将小岛命名为“外巴尔多尼亚公国”(即使现在，这个小岛仍是加拿大的国土)，差一点就要激怒苏联了。因此，阿伦德尔更加声名狼藉了。他在后半生经营了百事可乐的一个子公司，并在弗吉尼亚的猎狐旅游区当总管。

阿伦德尔一生的事业中，最成功的要数他 1937 年的那本书——《人人都神经》(*Everybody's Pixilated*)了。1937 年出版的这本书用许多名人的涂鸦汇编而成。这些名人中包括了卡伯·卡洛威、赫伦·海斯、休依·朗和温莎公爵(阿伦德尔的这本书选进了总统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涂鸦，其中有些也被我们这本书选用了。但是除了胡佛总统之外，其他最擅长涂鸦的总统比如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里根等，都是在阿伦德尔出书之后才进入白宫的)。阿伦德尔抓住了现代名人涂鸦的自然本性。他在“把一支铅笔，一个拍纸簿放在某些人的电话机旁，我敢说，他十有八九在打电话时涂鸦”。《人人都神经》这本书中写道，“一个赶牲口的也好，一个天才也好，都可以用铅笔画出犄角、圆圈、箭头、老

鼠、星星或者构思出其他图案,把这些东西串起来就成了一幅图画,简直就是精神病院里的那种超现实主义艺术。”

阿伦德尔的敏锐并且古怪的想法,是受了 20 世纪渗透在美国文化中且极其流行的弗洛伊德论的影响。几年之后,W·H·奥登写道,弗洛伊德当时已经“不是某个人 / 而是整个舆论的大气候”。他影响着电影制作人、社会学家、诗人、政策分析家。认为涂鸦与弗洛伊德流派相关是说得过去的。正如弗洛伊德所表述的那样,涂鸦“是人们的心理蓝图,是滑落到纸上的内心情感”。阿伦德尔在他的书中也相应的把涂鸦译释为“涂鸦者个性的外露”,甚至在书中列出了多达 10 页的图表,对 120 幅涂鸦作了简短的相关分析,让读者可以探索他们自己的心灵和弗洛伊德曾经在书中表述过的一些名人的心灵。

用弗洛伊德学说去解释涂鸦含义已经占了统治地位。曾经选登过阿伦德尔的收藏品中某些涂鸦样品的《纽约时报杂志》1947 年登了一篇文章,文中断定,潜意识能产生一个很大空间容纳梦想、爱好、灵感甚至深藏不露的事情。1982 年《时代》杂志在讨论总统涂鸦这一问题时也有类似的表述。

虽然上面这种观点占压倒优势,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1970 年一本涂鸦集的编者就持不同意见,他的名字叫诺曼·尤利斯。他分析了收集到的像贝蒂·格拉布尔、朱利安·邦得等名人的图画,断言“对我来说,涂鸦是一种艺术形式,它的象征性与其他艺术作品毫无两样”,“涂鸦也是很有趣的东西,但是仅凭观看某人的涂鸦,你是不可能判定他是干什么的,他是谁或不是谁。”

涂鸦实际上自成一类(特别是总统传达信息的涂鸦),因为他们不



是用来供人欣赏的。所以你不必把涂鸦当成是进入潜在意识的关键去确定涂鸦是或者不是普通的图画。上面提到的尤利斯曾向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夫尔·本奇索画，本奇回答：“按事先提出的要求去涂鸦，那必定会是赝造。原因就在于涂鸦是自发的，出自一种自然。事实上在收到你的信之前我已经毁掉了我乱涂的那些东西。”不少大师也都回绝了尤利斯的请求，不过很少有人给出恰当的理由，例如以色列内阁总理戴维·本-古里安的答复是：“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涂鸦’是什么。我在《简明牛津词典》中没找到这个词。你能向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涂鸦’吗？”

尤利斯确保得到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一幅涂鸦，因为有人帮了他忙。这个人就是讲稿起草人威廉·塞菲尔，也是一个涂鸦的收藏者，尼克松曾答应过给塞菲尔一幅涂鸦。尼克松不想公开他的涂鸦，担心心理学家看到他的内心世界。尽管如此，尼克松却喜欢以精神分析的方式去考虑问题。某次，他承认他试图译解别人的涂鸦。他对讲稿起草人弗兰克·坎农说：“我总要观察对方，看看他们怎样涂鸦。我画方块块、几何图形以及诸如此类形状的东西，也许（我是）一个保守的涂鸦者。”接着他又举例说：“1972年我们与勃列日涅夫第一次举行了导弹问题的会谈，在争论一枚很大的导弹能不能放进一个比较小的洞里时，我想勃列日涅夫一定会画一些洞，然后画导弹……看看导弹能不能装到洞里去，以及一些诸如此类的涂鸦。接下来，我们到面对黑海的一个海滨休息室碰面。在这种场合下他在涂鸦。他画了一个心脏，一支箭从中穿过。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明白他是在我们提出限制核弹头的建议没有达成一致的时候涂鸦的。我们提议限制核弹头，他们反对。”

很遗憾，尼克松没有对勃列日涅夫的大作发表看法。总之，凭自己

的直觉去完全理解对手涂鸦的意思更加重要。在这一点上，并不是说尼克松的这种偏爱有什么不平常，即使有些人坚持认为涂鸦缺少实在意义，但又无法抑制去了解涂鸦者的心态。近来在一些女性杂志或少女杂志上冒出不少写涂鸦的文章。《小姐》杂志(*Mademoiselle*)的大标题是“发现涂鸦上的你”，《少女》杂志(*Teen*)随之附和一篇特写——《涂鸦和曲线：说明什么》。

有人说涂鸦是会客室的一种乐趣。这种理解不会令人十分满意。问题不在弗洛伊德论，而在对涂鸦的表述很含糊。仅凭弗洛伊德的概念想准确地理解涂鸦者的主观意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任何一幅涂鸦的分析都必须有严密的推测和思考。(心理学家经常强调这一点。回到1947年，《纽约时报》采访的精神科医生夏洛特·坎普说：“对一幅涂鸦的理解必须要熟悉与此有关的人，才能把那些符号和图案与涂鸦者的内心和情绪因素联系起来。)遗憾的事情是，我们能从白宫的涂鸦中窥视到总统的精神生活十分有限。

总统的涂鸦的感染力必须界定在超出纯精神分析学的领域内。我们应该看到美国人民经年累月的与极具权威的统帅即总统的爱与恨的关系。

自从设立总统这个职位以来，美国人一直对总统有一种矛盾的心理。摆脱英国君主制之后，殖民者坚持要建立一个共和政体，人民高于一切。可是，他们在国家体制即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的联邦条例失败了，原因是它没有成立一个真正的国家政府，正如乔治·华盛顿说的“那是沙子制成的绳索”。为了补救，殖民地的显赫人物于1787年召开了制宪会议，拟定了一个包括设立总统这种最高权威职位在内的全新政府



形式的草案。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还是保持一种松散的联系结构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总统作为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是崇高的。1789年经一致推荐，华盛顿在神圣的气氛中宣誓就任总统，这更增加了总统的神秘感。虽然华盛顿使这个国家建立了信心，但是他从不以最高权威自居。他的重要性无可非议地使他的任期充满了威严。

人们十分尊敬华盛顿，即使在怀疑人生价值的现代社会里依然如此。作为政府最权威的官员，总统比任何其他个人都要紧贴国民利益。西奥多·罗斯福去西部旅行后说起人们去见他，是因为他们“感到总统是属于他们的，是他们国家的象征……他们对总统特别关注，盼望能见到他……他们期待他能使他们的渴望变成现实”。总统是他们实现愿望可信赖的人。国家的最高元首享受着奢侈的就职仪式，华丽的住房和专机，有自己的信号曲(theme song)，这是他的国人无法相比的。总统们的头像使美元增色。因此，很难听到骄傲的父母会说希望孩子们长大以后成为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

调查表明，孩子们最初是通过总统是国家的象征去了解自己的政府的，尽管没人向他们暗示过总统究竟是做什么的。当一位总统去世时，成年人都会经历一次悲痛。尼克松的白宫辩护人约翰·迪安在水门事件期间谈到如何“保护总统”时说：“尼克松总统。我本能地想到了航空母舰，战争，值得尊敬的坚强者，世界对话的网站。”与此同时，他成了新闻媒体的目标，关于他的新闻，比其他任何一个美国人多。亚利克斯·托克维尔的文章中说，“政府官员们清楚，能获得权力并保持自己的职位的重要前提，是在生活方式上与大众保持平等。”托克维尔处在选举活跃期，即参加投票的人第一次激增的时期。总统候选人安德鲁斯·杰